

笔耕岁月

陈 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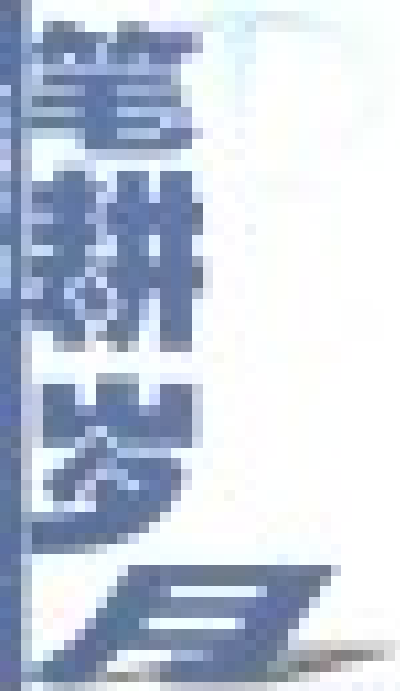
副刊编辑杂忆

FuKanBianJiZaYi

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生服务于报业，当一名副刊编辑，既无辉煌的业绩，更无显赫的头衔。说起工作，就是组稿、编稿、发稿、看小样、清样、大样、寄报纸、汇稿费给作者……平凡而又琐碎，但我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深深觉得：副刊编辑为读者在工作之余提供一份文化大餐、精神补品，让他们既得到生活调剂和休息，又可以陶冶性情，增进知识，这何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副刊编辑联系的是文坛才俊、社会精英，与他们接触渐广，交往日深，必然获得感染、熏陶和教益，使自己在业务上、在文学艺术的修养上、在人格锤炼上有所长进，有所提高。如今，我已年逾古稀，离岗多年，作为一名副刊编辑的退伍兵，越来越感觉到这份工作的可贵，这些云烟往事不应让它瞬间飘逝，而应摄入镜头，以俟同好；这些点滴经验不应弃如敝屣，而应提炼总结，奉献给后来者。这就是我写这本《杂忆》的动机和目的。



上海书店出版社



陈国英

创刊编辑杂忆

陈国英

1980年10月，在《光明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胡乔木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办好《光明日报》，首先要办好《光明日报》的编辑工作。”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1981年，我调到《光明日报》任副总编辑，分管编辑工作。在《光明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我再次听到这句话，更加感到这句话的分量。在《光明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我再次听到这句话，更加感到这句话的分量。在《光明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我再次听到这句话，更加感到这句话的分量。

笔耕岁月

陈 诏 著

副刊编辑杂忆

⑥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耕岁月——副刊编辑杂忆 / 陈诏编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3

ISBN 7-80622-681-8

I. 笔...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6737号

笔耕岁月——副刊编辑杂忆

著 者 陈 诏

责任编辑 竺金琳

装帧设计 程 钢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02年3月第一版 200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书 号 ISBN 7 - 80622 - 681 - 8/I · 165

定 价 20.00元

笑嘻嘻的副刊编辑

——代序

袁 鹰

鲁迅先生曾经为我们描述过二十年代一位报纸副刊编辑孙伏园的面影：“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点东西，……”

这个“东西”不是别的什么小东西，而是不朽的名著《阿Q正传》。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促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坐，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做一章。”（《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这段妙文年轻时读过不止一遍，当时只觉得写得生动有趣，寥寥几笔，就传神地勾画出一位副刊编辑的形象。到后来自己当了副刊

编辑,再读到此处,就不禁对这位胖胖的、笑嘻嘻的老前辈肃然起敬。我甚至想:当年倘若没有孙伏园每周一次的催促,《阿Q正传》可能不会那样顺利地按期问世。如果真是那样,这位副刊前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功绩真是太大了。后来我还常向副刊同事谈起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希望我们的同事都能学习伏园先生,常常向一些老作家登门拜访,笑嘻嘻地说:“先生……”

伏园先生的“笑嘻嘻”,肯定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绝不是敷衍的微笑,也并不仅仅因为他和鲁迅先生是老朋友。一个副刊编辑,如果能催到好作品,不论是连载小说,还是一篇散文、杂文、一首诗,都会有一种由衷的欣喜,甚至会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块异彩纷呈的副刊版面,就是编辑的得意杰作、心血结晶,如同作家写出一篇好文章一样。编副刊的同道对此都会有同感。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感受,若是遇到某一位并不善解人意、甚至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作者,副刊编辑就有气受了。几十年前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位老作家,来稿时一再强调他的稿子不能动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即使明显的错别字也不让动。对这样的作者,即使名气再大,也只得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幸而这类碰不得的“天王老子”为数极少。难怪有些编辑同行常爱引用唐人“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诗句,发发牢骚,诉说委屈。其实细细想来,也大可不必。这至少在情绪和风格上比当年的孙伏园先生逊一筹了。

说了这堆闲话,其实是为陈诏同志的大作做点铺垫。陈诏兄在《解放日报》当过多年的副刊编辑,不仅是我的同行,也是先后同事。《解放日报》是我的“娘家”,原址上海汉口路309号是《申报》旧址。我青少年时代最早投稿便是给《申报》的《自由谈》、《春秋》两个副刊的。这种因缘,一直维系下来,我现在同《解放日报》的副刊《朝花》仍有亲如一家的关系。陈诏兄退休前,我们常有来往,他也是一位“笑嘻嘻”的副刊编辑。报纸总是有多方面的许多作者、朋友,你去他来,川流不息,而副刊的朋友和作者是最长久的,即使有朝一日副刊停办

了,人们也会长久地想念它。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副刊通过它的编辑,能联系作者,广交朋友,因此它也就成为作者的好朋友。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副刊编辑的辛勤耕耘,必定会得到丰盛的收获。陈诏兄这本书中许多篇章,尤其是后半部,又一次证明这一条普遍真理。副刊编辑的岗位,可以让你接触各方豪杰,结识天下名流,特别是艺苑精英,文坛硕彦。你要请他们写稿,就需要尊重他们,熟悉他们,了解他们,渐渐地取得他们的信任。作者不仅将稿件交给你,也将心交给你。而这种机缘,不是任何人都能遇到的,更不是任何人都能把握住并且处理好的。陈诏兄结识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同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成为知交,这也不是每个副刊编辑都能达到的。“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此种境界,大概是我辈常心向往之而尚未企及的。

陈诏兄信上说:“说实话,副刊编辑在社会上、在报社内部地位最低,任何评奖、评优均很少考虑到副刊编辑。很多人都是默默无闻,终其一生。”话说得有点伤感。凭心而论,“地位最低”云云倒未必,“任何评奖、评优均很少考虑”,则可能与事实相距不远。京城文坛上人们常赞誉“四大名编”都是大型文学刊物的资深编辑,而副刊编辑不与焉。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为人作嫁,甘当人梯,正是副刊编辑的独特品格,何必自惭自伤、自怨自艾呢?时下流行表彰公仆的民间谚语:“千奖万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这话说得极好,如果套用过来,略改数字,也可以赠给副刊编辑:“千奖万奖,不如读者夸奖;金杯银杯,不如作者口碑”。果能如此,当是对副刊编辑的最高奖赏。

三年前我出过一本小书《两栖人语》,写的也是当副刊编辑多年的经历和感受,同陈诏兄这本书的路子差不多。书前我写过这么几句:“京华四十五年来,一边当报社编辑,一边业余写作。风风雨雨,离合悲欢,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甘苦冷暖,也都不必为外人道。但是我感谢这个机缘,不但至今不悔,而且常常引以为荣、引以为乐。

它使我遇到更多的师长,结识更多的好友,更使我在长期的磨砺熏陶中逐渐学会认识世界,认识生活;逐渐学会如何分是非别善恶;如何做人、做事、为文。这都是一生受用不尽的。”

如果人生道路可以重返,今天再让我选择一次职业岗位,我别无选择,仍然是当一名笑嘻嘻的副刊编辑。不知陈诏兄可有同感?但他不止是副刊编辑,也是一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近二十年来,先后有十多种关于《红楼梦》、《金瓶梅》和饌食文化的文史专著问世,有的在香港、台湾和日本同时出版。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中国饌食文化》一书,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使人爱不释手。不过这是他的另类笔墨、别样风光,不在这篇小文闲话范围之内了。

2001年初秋,索华未了斋



陈诏，笔名虞兮、思藻。浙江镇海县人，一九二八年生。上海资深新闻工作者，曾先后在《新闻日报》、《解放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二十余年。业余时间从事古典文学和饮食文化研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并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有《红楼梦与金瓶梅》（与孙逊合写）、《红楼梦小考》、《红楼梦谈艺录》、《红楼梦的饮食文化》、《金瓶梅小考》、《金瓶梅六十题》、《美食寻趣》、《文史拾穗》、《梦余痴话》等十余种著作。

目 录

笑嘻嘻的副刊编辑——代序	袁 鹰 1
--------------------	-------

自 叙 篇

我和副刊	3
回忆采访“一大”会址及南湖	16
我和《红楼梦》、《金瓶梅》	20
我和饮食文化	30
我和杂文	35
我的业余爱好	38
吴门学画记	47
笔之恋	53
我的旧书缘	56
我和古籍书店	59
在香港逛书店	62
台北书街漫步	64
新加坡中文书店一瞥	66
悉尼读书生活杂记	68
百家书简记真情	71
附：作家书信统计表	76

我收藏的作家贺年卡	78
红楼圆梦到台湾	81
与“张大千”合影	85

师 友 篇

约巴金写杂文	89
采访梅兰芳	92
周瘦鹃掠影	94
吴湖帆重新“出山”	96
周作人一稿三投	99
腰斩张恨水《记者外传》	101
许杰老师鼓励我写小说	103
史树青——我的红学研究的带路人	105
吴世昌二三事	108
周振甫的一篇遗文	111
陈巨来赠印	114
刘海粟《贺新郎》词手迹	116
“不老松”赵景深	118
王朝闻婉言辞写序	122
吴组缃谈警惕市侩主义	124
俞平伯在香港	126
周汝昌唱和《咏曹雪芹》	129
周汝昌与“曹雪芹墓石”的真伪之争	131
读旧信忆唐弢	133
苏渊雷诗才追谪仙	137
回忆夏公	139
夏衍笔名拾遗	145
双“钱”佳话	148

钱钟书谈《围城》的人物索隐	151
钱钟书谈他的诗	155
端木蕻良诗画传情	159
关于端木蕻良与萧红的“公案”	163
端谿“公案”有了新说	168
拾得旧梦祭于伶	172
于伶谈聂耳	177
施蛰存的晚年生活	181
施蛰存谈《金瓶梅》	184
徐迟印象记	187
萧乾——不知疲倦的老人	191
陈荒煤的暮年情怀	199
柯灵“文章老更成”背后	204
柯灵的刚正不阿	206
柯灵及其未完成著作《上海一百年》	208
两访汪曾祺	211
刘绍棠,你责怪我吗?	214
唐达成“无官一身轻”	218
张中行不准编辑删改文稿	222
周而复的书法艺术	223
华君武画不厌改	226
华君武谈作者与编辑的关系	229
王蒙谈《红楼梦》	231
刘心武的“秦学”	234
记杂文家邵燕祥	237
“两栖人”袁鹰	240
我与未曾谋面的张贤亮	243
徐朔方的学者风度	245

飘然而去忆云乡·····	248
赵超构办报心无旁骛·····	253
陆诒的采访笔记本·····	255
“语不惊人”话拾风·····	257
伊藤漱平谈《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	259
周策纵首创“曹雪芹是瘦子”说·····	261
亦商亦文的周颖南·····	263
蕉风椰月话诗翁·····	266
遥念香港一枝梅·····	268
与荒木猛讨论《金瓶梅》·····	270
我与魏子云的友好争论·····	272
海天辽阔怀墨人·····	274
与症弦闲聊副刊·····	277
化学教授兼红学家刘广定·····	279
难得石头渡海回——康来新印象记·····	281
后记·····	284

自叙篇

我和副刊

像京剧演员上场一样,我先来自报家门。

我原名叫陈祖诏。听我母亲说,这个名字是我的姑父取的。他是前清秀才,有学问的读书人。但我始终不喜欢这个名字,曾经擅自更改许多次。大概二十岁光景,我开始在报上写文章,逐步固定署名“陈诏”,中间少了一个“祖”字。我的伯父看见了,始则大为惊奇,继而连连摇头,流露出一不悦之色。我猜中了,这不是数典忘“祖”吗?然而我已经沿用下来,不想再更动了。

我于1928年农历三月初一日生于浙江宁波城内。就祖籍而言,我是宁波镇海人。可惜,我从来没有到过祖上的老屋。据说我的祖父是光绪癸巳年的恩科举人,当时镇海县只有九名举人,我的祖父是其中之一。凭这一点,我完全有资格说自己出身于书香门第。可惜,不但我没有看见过祖父,连我母亲也没有看见过阿公。祖父中举时已到高龄,因此辞去了一个出远门的“教谕”官职,只在自己家乡开了一个私塾,授徒为业,靠束修为生。就这样,随着科举的废止,清朝的覆灭,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完全放弃“仕”途,转向商业。我的童年就是在一个小商人的家庭里度过的。父亲后来去香港当了一家商行的经理,使我过上几年“少爷”生活。

我不敢自夸含有祖父的遗传基因,但从我第一天上学开始,好像一直受到老师们的钟爱,是班级里的尖子。记得小学四年级时,

有一次老师叫我们自选题目做一篇作文，我的选题是《论白面书生》，写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老师把这篇作文夸了又夸，作为范文在学校里展览。从此我的作文在全校是闻名的。我相信，一个人走上文学道路也并不偶然，多半是由天资、禀赋所决定的。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一家从宁波迁移到上海，我在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里念中学课程。学校里的规矩是很严厉的，绝对不允许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却都是陈旧的、保守的。国文课教的绝大部分是古文，还选读《孟子》，教师是几位年迈的宿儒。但这种旧式的教育方法却帮助我打好古汉语的功底，大概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能熟练地阅读文言小说，使用文言写作文。当时，有一位老教师朱翔先生特别喜欢我，经常叫我星期天到他家里去，并把他的孙子介绍给我，作为我的师友。他的孙子，瘦长个子，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比我大六七岁，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金石书画、诗词歌赋都有一手。他让我看许多画册、法帖、印谱、古籍，使我大开眼界，得到启蒙，也兴致勃勃地玩起这玩意儿来了。到十八九岁时，我已经能写很工整的旧体诗，并在上海《大晚报》副刊上发表过六七首，这是我跟报纸副刊结缘的开端。从那时起，我看报纸时很注意看副刊。凡副刊上有我喜欢的文章、资料，我都剪下来贴在一本簿子上。我还向《申报·自由谈》投过四首《集龚定庵诗句怀念苏曼殊》诗。当然寄去后杳如黄鹤，未见刊用和答复。

我的父亲一直盼望我继承他的事业，而我对做生意却从内心感到厌恶，父子之间在选择人生道路上时时发生对抗。1948年底，上海解放前夕，我的父亲几次打电报来叫我去香港“避难”，我拗不过他，只得踏上旅途。到了香港，我对生意经仍然落落寡合，自己贪婪地阅读起进步书籍和革命理论来了。当时，香港的《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给我提供大量的新信息。毛泽东的